

紐約作為鄉園之一

——李渝作品的時空錯置與族裔地景*

謝欣苓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提 要

旅美多年的作家李渝，以溫州街系列而聞名，其作品大多聚焦於臺灣與變遷中的臺北城，藉由寫實與虛構的交錯、夢的意象與空間書寫，佐以繪畫與文學的知識與美學，呈現家國與懷鄉之思、流離經驗與國族意識。然而，不同於其他由臺灣遷居至美國的移民作家，絕大多數著眼於新居地美國的社會文化衝擊、族群問題或無（失）根感，李渝較少著墨於這些議題。就地理區位而言，自1970年代以來，紐約即是擁有第二多臺灣移民的區域，僅次於加州，而紐約市也成為許多旅美作家書寫的重心，儘管相較於其他作家，李渝的紐約書寫數量較少，但是紐約仍於其生命歷程中佔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本論文將探究李渝作品中的紐約書寫，試圖以紐約市為背景的文本分析，且置於臺灣旅美作家的紐約書寫系譜中予

* 本文初稿原題為〈李渝筆下的紐約／美國與時空錯置〉，宣讀於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舉辦之「論寫作：郭松棻與李渝文學研討會」（2016年12月17-18日）。感謝評論人黃儀冠教授與主持人黃美娥教授的建議，改寫期間感謝詹閔旭教授的啟發與回饋，亦感謝本刊諸位匿名審查者提供的寶貴意見，筆者受益良多，在此致謝。

以定位，是以理解移民與新居地之間的關係與對話，原鄉（臺北）與異鄉（紐約）的時空錯置，都市中的族裔關係，以及移民的身份認同議題，尤其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後，透過移民的角度，反思災害與人類生活轉變的關係，現代性想像與本質性追尋的重構，希冀在既有的李渝研究成果之外，提供另一個解讀其鄉園書寫的切入點。

關鍵詞：紐約 移民 族群 主體性 時空錯置

紐約作為鄉園之一

——李渝作品的時空錯置與族裔地景

謝欣芬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前言

我是也不是東方人或西方人；是也不是中國人或美國人；是也不是台灣人
或大陸人。本土更不用提了。什麼都是，什麼也都不是。

環境時常遷動，身份隨時改變。從具體到動搖，從具名到無名。這是一個
走失了位置和定義的過程，在台北和香港，人人往往都是相識的，然而在
紐約，你只是街頭匆忙人群中的一個面孔；You are nobody, and that is all.^①

前文引述李渝對於自我身份的反思與定位，呈現出認同與疆界流動的思考，以及
世界公民（cosmopolitan）的視野。在匯集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與觀光客的大都會
紐約，你誰都不是，卻也可以自由地決定自己是誰，人之渺小，世界之大，紐約
的包容與多元性，乃成為許多移民作家書寫的題材，而李渝亦是其中之一。多數
從臺灣出發赴美定居的作家所創作的作品，如叢甦《想飛》（1977）、曹又方《美
國月亮》（1988）、章緣《疫》（2003）、白先勇《紐約客》（2007）等作品，

① 李渝：〈漂流的意願，航行的意志〉，李渝著，梅家玲、鍾秩維、楊富閔編：《那朵迷路的雲：李渝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462。原刊載於《明報月刊》第41卷第7期（2006年），頁97。

著眼於紐約的中國人與臺灣人，以及與這些移民密切相關的曼哈頓、中國城與法拉盛等華人社群。叢甦的《想飛》由存在主義思考人與都市的關係，關照紐約中國人的心理意識與邊緣位置；《美國月亮》探討留學生到移民的身份轉移，在紐約社會中的生存問題與男女關係；章緣則聚焦於法拉盛的臺灣移民社群，從孤立的留學生轉而在地化，社群形成體現移民的歸屬感與認同。^②紐約作為一個重要的跨國移動樞紐，由上述的作品所梳理出旅美作家的紐約書寫系譜，可見每個作家因背景與美學策略的不同，而有各自書寫的視角與關照的重點，李渝遷移至美國長達四十多年，尤其後半輩子長居於紐約，紐約之於李渝是另一個鄉園。在一次訪談中，李渝指出紐約之於她的意義，認為在臺北生活很美好，但是紐約的環境提供她寫作的刺激，「從寫作的角度她體驗了紐約不同於台北的地方，『紐約有一種 edge——「邊緣性」，一種對處境的敏銳和警覺，各種對高標的不妥協』在紐約，沒有專業水平不可能上場。」^③可見，紐約對於她的書寫有深遠的影響，並使她保有高度的敏感性，邊緣的位置也激發了不同的觀看視野。此外，對於何謂鄉土，她也提出了一套解釋：「文學自然是有其鄉土的，鄉土的『土』歸之於泥土、土地，地理上的土源。『土』有其必要，否則立足點會有浮游的危險。可是『鄉』卻是另一回事，無須和『土』綁在一起來理解。」^④別於一般故鄉／原鄉書寫所強調的固著性（rootedness），李渝的鄉園存在文字中，是由語言所構築的，正因如此，鄉園可以是複數，亦可以穿越時間與空間，同時「溫州街、台北、紐約是土地；歷史、記憶、生活是能源」^⑤因而多重的鄉園想像豐富她的思考與書寫。儘管她的作品以臺北的書寫為主，但是從這些留下來的篇章中仍可隱約窺見紐約的日常痕跡，那麼在這些以紐約為背景或者直接描寫紐約的作品究竟具有哪些意義與特殊性呢？除了溫州街系譜之外，同樣作為地方書寫的紐約空間是否體現出其他的意涵？

② 關於臺灣旅美作家的紐約書寫研究，可參閱謝欣芬：《異鄉人的紐約：華文小說的離散華人書寫與地方再現》（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③ 宋雅姿：〈鄉在文字中〉，《文訊》第309期（2011年7月），頁41。

④ 同前註，頁42。

⑤ 同前註。

李渝（1944-2014）出生在戰爭中的中國四川，後隨父母移居至臺灣，在六〇年代末期留學於美國，後來定居在紐約，並於紐約大學任教。創作始於中學時期，就在《中國一周》「青年園地」發表數篇作品，如〈國之本在家〉（1957）、〈母親〉（1958）等^⑥，就讀臺灣大學外文系時，修習聶華苓所開授的創作班，作品受到聶的欣賞，該時期的作品陸續發表於報章雜誌，如《文星》、《現代文學》、《中華日報》等^⑦，出國之後因保釣運動和學術研究，寫作一度中斷，後來才重新提筆，重返文學創作。^⑧出版的作品包括《溫州街的故事》（1991）、《應答的鄉岸》（1999）、《金絲猿的故事》（2000）、《夏日踟躕》（2002）、《賢明時代》（2005）、《九重葛與美少年》（2013），以及在李渝過世後由梅家玲、鍾秩維、楊富閔編選的《那朵迷路的雲：李渝文集》（2016）。

1960年代末期離開臺灣之後，李渝進入了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攻讀藝術史，並獲得博士學位。1970年代保釣運動爆發，李渝和其夫郭松棻在美國響應此活動，當時美國留學生與移民作家中，數位曾書寫到保釣運動，例如張系國的《昨日之怒》（1978）和劉大任《遠方有風雷》（2010）等，這些作品皆呈現了旅美知識份子對於保釣運動的關注，在異鄉藉由此活動的參與，表現知識份子的愛國之心與懷鄉之思。李渝為保釣運動中少數的女性作家，在釣運發生時，她正經歷創作中斷期，直到1980年代重拾寫作後，也曾以文字回顧保釣記憶，如〈關河蕭索〉和〈保釣與文革〉等，道出了她對當時在柏克萊參加保釣運動的回憶與反思。

同為1960年代赴美國求學的作家，但李渝卻鮮少被定義為「留學生作家」或「移民作家」，主要的原因是因相較於以白先勇所定義的「流浪的中國人」^⑨為主

⑥ 參閱〈李渝創作·評論·翻譯年表初編〉，李渝著，梅家玲、鍾秩維、楊富閔編：《那朵迷路的雲：李渝文集》，頁479。

⑦ 黃啟峰：《河流裡的月印：郭松棻與李渝小說綜論》（臺北：秀威出版社，2008年），頁35。

⑧ 梅家玲：〈導讀無限山川：李渝的文學視界〉，李渝著，梅家玲、鍾秩維、楊富閔編：《那朵迷路的雲：李渝文集》，頁1。

⑨ 白先勇：〈流浪的中國人——臺灣小說的放逐主題〉，《第六隻手指》（臺北：爾雅出版社，1995年），頁293-305。白先勇認為許多外省第一代和第二代作家的作品中，常出現流放的主題，因為他們不僅經歷了地理上的遷移，同時也深刻地體驗到心靈的漂泊，因此不斷地流浪，而無法落腳。

題的作家，如叢甦、於梨華、聶華苓、陳若曦等人，著眼於在異鄉的失根感、文化衝擊或認同危機，李渝的作品鮮少處理這一方面的議題。除此之外，語言亦是移民作家經常必須面對的問題，持續以母語書寫，或者全然放棄，都是一種認同與意識型態的選擇，叢甦認為所謂的「流放文學」是指「在異鄉以母國的語文書寫來自母國的人物與事件。因為一個人與生俱來的語言是身理在他的骨肉與血脈之中的。……所以雖然身處異鄉，他仍然書寫自己的同胞、自己的故國。這也是順理成章的。」¹⁰就語言而論，李渝並沒有選擇的問題，創作一直以母語進行，但是內容卻不太觸及異鄉的人事景物，如楊佳嫻所述：

回到李渝的小說來看，海外生涯中，隔著空間上的距離，加上時潮的衝擊，李渝作品竟罕見地不常以異鄉的孤寂、去國與歸鄉的糾結為主題，反而一再地回憶，回到了她「度過中學和大學這一段生活中最敏感的時光」的溫州街，當中透露了這條街道「賦予我的意義，所挑引的情思、祈望或幻想」（《溫州街的故事》自序），懷念之外，更有拔高與遠溯的企圖，透過含蓄的書寫對一個閉鎖時代扭曲的種種做出反詰，提昇可有暴力／狹窄趨向的民族情感，轉化為對文化根源和心靈根源的追尋。¹¹

大多數的研究者都指出李渝的作品著重於溫州街和臺北人兩大主題¹²，探究其生活在此街區裡的一點一滴，小說主角為與她經歷同樣時代背景的人物，隱藏著許多關於中國的文化想像與濃厚的原鄉懷舊之思。楊佳嫻歸納出李渝「臺北／人」書寫的兩大特色：「一是父母的歷史、文化的鄉愁，二是台北的部分；前者是壯闊的、久長的，和民族命運相聯繫，後者則是從現實生活中留存的痕跡，更屬於個

¹⁰ 叢甦：〈沙灘的腳印：「留學生文學」與流放意識〉，《文訊》第172期（2000年），頁50。

¹¹ 楊佳嫻：〈記憶啟蒙溫州街——論李渝的「臺北人」書寫〉，《中國文學研究》第17期（2003年），頁206。

¹² 除了楊佳嫻的論述以外，亦可參見鄭穎：《鬱的容顏》（臺北：印刻出版社，2008年），王德威：〈無岸之河的渡引者——李渝的小說美學〉，收錄於李渝著《夏日踟躕》（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

人記憶。」¹³ 蘇偉貞與黃資婷的研究也指出李渝小說藉由跨藝術形式的挪用體現出懷舊現象¹⁴，王德威亦認為「似曾相識，既陌生又親切，李渝是不自覺的『詭異』（uncanny）效果試驗者。」¹⁵ 以此方式來書寫回憶並建構時間的史觀。由此可見，以溫州街或臺北為背景的小說創作，所指向的都是過去的時間，並體現出懷舊與鄉愁，那麼同樣作為李渝生命中關鍵地方之一的「紐約」，在她的筆下所呈現的形貌與衍生的意義為何呢？

李渝觸及紐約、美國和共同生活在美洲大陸上的人們之書寫，約有下列數篇小說和散文作品，〈關河蕭索〉（1972）描述主角「我」至紐約參與保釣運動，並與父親友人蔦叔相見時所引發的懷鄉之思。〈從前有一片防風林〉（1985）刻畫兩個在臺北讀書時的女性友人，多年後在紐約街頭的故事，並進一步討論去留的選擇。〈煙花〉（1983）以雙線敘事主角阿蓮赴美求學，卻反覆牽絆於生活在臺北溫州街的音樂老師戴敏愁。〈叢林〉（2013）記載主角在紐約幫助了兩位來自臺灣的青年，卻使之陷入了回憶與真實的思辨之中，思索回憶的可靠性。〈華盛頓廣場〉（1983）和〈五個東歐婦人〉（1983）以散文形式書寫李渝在紐約的生活與所見的形形色色不同族裔的人物，〈女明星·女演員〉（1983）記述一個中國女演員的性別角色與表演生涯，〈交腳菩薩〉（2007）描寫參觀大都會博物館時，見到菩薩憶及亡夫郭松棻的思念之情。¹⁶ 〈給紐約〉（2001）則是寫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體現她普世的關懷。由上述篇章的簡介，可證明李渝紐約書寫之存在，她曾在創作中將場景設定在紐約或者美國，在移居長達四十多年之中，想必對這塊土地亦有所感情，並且在此工作、成家並孕育下一代，她所再現

¹³ 楊佳嫻：〈離／返鄉旅行：以李渝、朱天文、朱天心和駱以軍描寫的臺北小說為例〉，《中外文學》第34期第2卷（2005年7月），頁138。

¹⁴ 蘇偉貞、黃資婷：〈立望關河到鶴群歸來：李渝小說跨藝術互文的懷舊現象——以〈關河蕭索〉、〈江行初雪〉、〈無岸之河〉、〈待鶴〉一組小說為主〉，《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24期（2017年4月），頁169-198。

¹⁵ 王德威：〈無岸之河的渡引者——李渝的小說美學〉，收錄於李渝著《夏日踟躕》，頁18。

¹⁶ 由於本篇論文的研究問題為時空錯置與族裔地景，〈女明星·女演員〉和〈交腳菩薩〉的內容並非在此範疇之內，因此後文將不納入討論。

的紐約必定與其生命經歷以及生活的所觀所感產生聯繫。

也許，正如李渝所說，在紐約，你誰都不是，卻同時也跟著這個城市的脈動而生活，而呼吸，彼此疏離卻也相近。紐約之於觀光客，炫麗而迷人，之於不同族裔的移民，總是可以找到一個棲身的街角，之於紐約客／原居者，它是世界的中心，各方人群與文化匯聚，走在時代尖端而令人驕傲。棲身於此，李渝又是由什麼樣的視角在觀看這座城市呢？本文在既有的李渝研究系譜之上，尤以溫州街／臺北書寫為主體的研究成果，試圖提供解讀李渝的地方／紐約／鄉園書寫的另一種途徑。李渝的作品包括小說、散文與評論性文章等不同文類，以紐約為題材的作品主要以小說和散文兩種文類呈現，因此擇以四篇小說（〈關河蕭索〉、〈從前有一片防風林〉、〈煙花〉與〈叢林〉）和三篇散文（〈華盛頓廣場〉、〈五個東歐婦人〉與〈給紐約〉）為討論文本，藉由兩個層面——「臺北與紐約的時空錯置」與「城市空間與族裔地景」，由移民者的視角出發，探究李渝如何再現紐約／美國，以及此一地方之於作家的意義為何。

二、臺北與紐約的時空錯置

重慶生我，台北育我，柏克萊教我，紐約養我，無比榮耀的城市，都是我的鄉國。¹⁷

此四座城市之於李渝皆有不同的意義，重慶作為出生地，是原鄉；臺北承載了成長與求學時光，又以溫州街的記憶為最；柏克萊使她進入了藝術史的殿堂也經歷了保釣，最後紐約陪伴她走完人生的後半輩子，也許四座城市都是家，也不是家，藉由她的文字，我們能夠理解了不同城市對於經歷多重跨國移動的移民所產生的複雜意義。

時空的錯置（dislocation）是移民歷程中的一個重要經驗，亦是具有移民身份的作家經常在創作中使用的概念，將原鄉／異鄉、過去／現在並置於文字中，體

¹⁷ 李渝：〈給紐約〉，張曉風編：《九十年散文選》（臺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頁344。

現出一種時間、空間、身份與記憶的斷裂或者連結。薩拉·艾哈邁德 (Sara Ahmed) 認為移民即是「一個疏離的過程，從寄居於家的事物中疏離……它參與了一個轉譯的過程，從一個意象到另一個的移動。」¹⁸，凱文·羅賓斯 (Kevin Robins) 和阿蘇·阿克蘇伊 (Asu Aksoy) 也認為「移民包括了空間與時間的錯置，從原鄉分離並拉出距離，造成過去與現在的不連續。移民的過程中，斷裂必然發生，而這樣的斷裂與不適感有關，無法完全進入現在，或者現處的這個空間。」¹⁹ 由此可知，時空錯置與移民的生命經驗息息相關，因為經歷了至少兩種以上的地方與文化，在時間上由過去遊走到現在，因此時空錯置所產生的複雜性值得留意。

在異鄉思念故鄉的情緒與鄉愁，時常湧現在移居者的心中，李渝的〈關河蕭索〉書寫主角「我」到紐約參與保釣運動的故事，身在紐約時，見到父輩友人與其住家前的河所憶及的卻是遠方：

遠方又是什麼？我在想，然而在冷夜裏，數丈之外一切就消失了。黑暗將四周化溶得無端無涯，蒼茫而恍惚，無從分出天地物的界線來。只有眼前，或者更切實地說，只有這六方空間前的河水才是實存的。

東方之月端端正正，君臨天下，照在這段河水上面。三、四點的夜靜悄而喧嘩：靜悄的是沉沉睡去的人的世界，喧嘩的是夜光下的河水。在寂寞而不能睡的夜裏，為叔必定也常來到這窗前，看水流轉化為無數幻境吧。它不再是紐約的一條河；它是淡水河，是黃河，是家鄉城外的河，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他王國裏的一條河，在星月的夜，唱著彼此的歌，安慰著流浪的心，我有點明白為何為叔可以數年住在這異鄉的十五樓公寓而無所怨尤了。²⁰

¹⁸ 筆者翻譯，引述自 Sara Ahmed, "Home and Away: Narratives of Migration and Estran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3 (1999): 343.

¹⁹ 筆者翻譯，引述自 Kevin Robins and Asu Aksoy, *Transnationalism, Migration and the Challenge to Europe: The Enlargement of Mean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86.

²⁰ 李渝：〈關河蕭索〉，《應答的鄉岸》（臺北：洪範出版社，1999年），頁164。

寄情於景，撫慰了移民心中的寂寞與思鄉。將紐約的河流，透過想像與記憶，將之與臺北的淡水河，中國的黃河，又或遠方家鄉不知名的河並置，河的流動性似乎可以抵達遠方，河的相似性承載了主角「我」心中對原鄉的回憶，異鄉的河與原鄉的在「我」的眼眶中相會了，如此的空間錯置藉由「我」的想像完成了。藉此思彼，為移民小說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景物具體化移民的鄉愁，藉以傳達思鄉之情，也同時表達了在異鄉定居的願望實現，將鄉愁寄予河的流動，而個體卻已然踏實地落腳新居社會。

延續時空錯置的書寫策略，李渝小說〈從前有一片防風林〉描寫在異鄉與小時候的友人重逢，一同想起從前，兩地兩個時空的故事也就此接續起來。對於移居地的描寫，別於白先勇或劉大任等移民作家往往將移居地的異鄉生活以及家國之思與國族書寫作為連結，李渝的視角多聚焦在私我情感與日常記憶。這篇小說描寫兩個成長在臺北的女孩，上同一間學校，畢業之後都出國留學，失聯多年之後在紐約重逢的故事。小說藉由過去的臺北與現在的紐約兩條線交織而成，小說中的兩個女性人物，相約在週五下班後，在紐約一間種著九重葛的咖啡館相見，話說從前：「因為，很多年以前，叫作青島的曾有一家夜飲店，在台北，裏邊種著一株九重葛，也曾這樣斜攀上窗椽。」²¹九重葛是李渝時常使用的植物意象，一如作品集《九重葛與美少年》即是以此為題。在這篇小說中，時間與空間錯置於九重葛上，年輕時的臺北與中年時的紐約，因九重葛而有了交集，城市的界線因此變得模糊，正如小說中的時間與空間並非明顯地區隔，而是曖昧地並存，一下寫紐約，一下又跳至臺北，咖啡館作為一個記憶交錯的空間，在其中任憑時空自由穿梭與想像，並且「讓鄉愁帶領路程」²²。有趣的是，相似於〈關河蕭索〉的情感，面對現居的這座城市，在思索「回去不回去」的命題時，懷有坦然自在、隨遇而安的態度：

她們並不急於作出前面提到的決定，或者其他哪樣的決定，要去改變某種

²¹ 李渝：〈從前有一片防風林〉，《應答的鄉岸》，頁92。

²² 同前註，頁96。

現狀，變更某種節奏，建立某種指標，以至於要去反叛打倒什麼，肯定什麼，擁護什麼。曾經化著各種形態的夢想的焦慮的時光已經過去。這一時的黑空，當她們推開門時，春天快來的夜晚已經溫暖而濕潤。²³

別於移民初抵異鄉時的徬徨失措，久居於異鄉逐漸衍生的是安然自在，這篇作品體現移民積極地面對此時此地，亦是一種認同的抉擇，處處皆可成為鄉園，而紐約即是其一。

雙線並行的敘事手法時常用於呈現時空錯置的概念，李渝的〈煙花〉敘述阿蓮暗戀音樂老師戴敏愁的故事。一線寫於在臺北和戴老師學琴的青春歲月，另一線則設定在阿蓮到紐約攻讀音樂的生活，在異鄉的困境中，戴老師的理解成為阿蓮繼續奮鬥的唯一支持，回憶成為移民在異鄉打拼的動力。透過阿蓮朋友張惠一次又一次從臺灣帶回紐約的消息，阿蓮得知戴老師在臺北的現況，直到死去，而臺北的記憶並不曾消失在阿蓮的生命中，是鄉愁羈絆著她，就像在異鄉的中國城，想念家鄉的食物：

中國城多得是天津棗，卻不見有松香加紅繩的。買了三盒盒面印著紅蝴蝶結的，先嚐了一粒。乾澀得很，不知母親說的好在哪裏。

母親這樣想吃蜜棗，不過是鄉愁罷了。要說真好吃的東西，阿蓮想起古亭市場的巷口，那臉盆裏泡著的番石榴。²⁴

在此李渝寫到了紐約的中國城和臺北的古亭市場，又是一次的現在與過去，雙城的並置，小說中母親的鄉愁是天津蜜棗，而阿蓮卻是古亭市場的番石榴，食物承載了人們的鄉愁與原鄉回憶，儘管中國城能夠買到各式各樣故鄉的水果與食物，唯有當時在家鄉所吃的滋味才是最甜美的。然而，不同於前面討論的兩篇小說〈關河蕭索〉與〈從前有一片防風林〉，人物似乎相對地安然生活於紐約，異鄉已逐

²³ 李渝：〈從前有一片防風林〉，《應答的鄉岸》，頁98。

²⁴ 李渝：〈煙花〉，《溫州街的故事》（臺北：洪範出版社，1991年），頁215。

漸成爲故鄉，〈煙花〉中的阿蓮始終活在音樂老師與臺北編織而成的夢境之中，紐約之於阿蓮彷彿惡夢，所有的不順遂導致她將所有的希望寄託在回憶。值得一提的是，阿蓮又不像白先勇、於梨華或叢甦筆下被無根感籠罩的移民，阿蓮的生命是有根的，根於臺北，帶著回憶在異鄉生活。即使在紐約出現不適感，卻因爲擁有音樂和戴老師的期待而活著：

坐在暗紅色的地毯上，斜靠著唱機櫃的一角，在空寂而黝暗的屋裏，讓琴聲帶領自己與音樂再見面。雖不過是二十或三十分鐘的時間，總能重生出生活的勇氣，再一次可以無懼地走入外頭熙攘的人群，進入渾黯無光的地下道。²⁵

這篇小說的主角阿蓮，對於異鄉的認同選擇，是一個不進入卻也不抵抗的方式，在記憶中擁有原鄉，卻也能在真實生活中前進，藉由具體與虛擬空間的相互指涉，完成主體的建構，這亦是時空錯置的另一種作用：居中（in-between）的位置²⁶，移民的能動性使之能夠挪用原鄉記憶於異鄉的生活實踐。

從異鄉回望原鄉，是多數移民作家擅長處理的題材，其中記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記憶如夢，既真實又虛幻。李渝在〈叢林〉裡觸及記憶的虛設性：「出於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意願，或因現實的需求，我們總是持續不斷地在修改和美化記憶，甚至製造記憶，以便釀製出荒原上的蜃境，平庸生活的奇幻版本，對自己有利的歷史敘述，以及沒有遺憾缺陷的光榮的自己。」²⁷ 記憶的挪用、書寫或者再創造，皆是生命中不斷進行的動作，對於帶著文化差異在異鄉生活的移民而言，記憶有時候是寶藏，總是如此美好，有時候卻像夢魘，試圖擺脫卻始終無解，然

²⁵ 李渝：〈煙花〉，《溫州街的故事》，頁 213。

²⁶ 霍米·巴巴（Homi Bhabha）在討論主體形成時，指出所謂的居中性（in-betweenness）是主體在協商過程之中，挪用或表述文化異質性時產生的不同建構方式，以及在兩種或多種文化之間協商的位置與空間。參見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²⁷ 李渝：〈叢林〉，《九重葛與美少年》（臺北：印刻出版社，2013 年），頁 179。

而卻都是構成自我的要素。記憶成爲書寫原鄉生活的來源之一，但因爲時間的流逝導致空間的變動，讓人們因而質疑記憶的真實性。

在異鄉遇見來自同一塊土地的人總是特別親切，這樣的相遇總是引入了過去的時空，使之重新回到移居者的腦海裡。〈叢林〉講述主角在紐約遇見兩個來自臺灣的青年男女，將財物遺忘在計程車上而身無分文，主角上前幫忙並借錢給他們。其中的男性一個叫福克納的混血男生，住在臺北林森北路，父親是美國南方人，主要是來美國尋親的，在主角所在的紐約相遇。然而，小說寫道：「無論是向北向南，都看不見了那突然出現又突然消失的從台北來的青年。」²⁸ 似真似假的事件，造成主角回到臺北，試圖尋找記憶中的美軍顧問團，小說的敘事線，瞬間從紐約跳接到臺北：

林森北路十字路口。上午。街道還沒就緒，店家不是仍鎖著鐵門就是裡外空靜靜的，看不出傳聞中的繁華綺麗。成長在南區的我難得來到這裡，大部分的地點都是陌生的。沒有記憶提供多層次意識，超越現實的存在不存在，當前就只有現實，也就是說，眼睛能看見的就是所有了。這一條如同異鄉的長街對黃昏青年的意義自然遠比對我為多。²⁹

回到曾經生活的臺北城，主角卻迷路了，找不到目的地——「美軍顧問團」。眼前是現實，但不是記憶中的那個現實，事過境遷，原鄉地景的改變造成一種疏離感，彷彿身在異鄉而感到陌生。小說中的主角坐上計程車，試圖尋找美軍顧問團，但這個空間早已不存在，和朋友討論之中質疑起自己記憶的真實性，彷彿這是一場夢。

歸返原鄉是可能的，但回到記憶中，那個存於過去時間的原鄉卻是難上加難，更正確來說這樣的空間並不存在，移動所造成的時空斷裂是真實地讓人疼痛，尤其在尋找未果之後。前幾篇作品中，時空錯置的策略一次又一次被挪用，但是在

²⁸ 李渝：〈叢林〉，《九重葛與美少年》，頁174。

²⁹ 同前註，頁175。

〈叢林〉這篇小說中，李渝試圖藉由主角對記憶的質疑告訴讀者拋開記憶的重要性：「回憶不必要，反思不必要，在各種各樣的事物裡努力尋找意義而緬懷感傷等之不必要。被記憶困住是沒有意思的，生活要你在無意義中領悟涵義，覺悟出，就是涵義也是沒有意義的。」³⁰以移民生活為題材的作品中，歸返（return）與尋根（root-searching）往往是重要的主題，同時也隱涉移民的認同與鄉愁，在這篇小說中，因為遇見混血青少年而促成的返鄉之旅，確認主角體悟原鄉記憶的不真實，而紐約的地景反倒是鮮明地出現，形成一種對比。透過城市空間的對照，也點出了移民在地化的可能性，在清晰與模糊之間作出了認同的選擇。

臺北與紐約的時空錯置，是李渝小說中重要的題材，特別是刻畫在美國生活的移民時，兩個空間與兩條時間軸的並行，所帶出的詮釋與作用，在在指出移民與城市之間的關係，以及透過時空錯置所探究的認同議題，而在李渝的作品中透過精神與文化上的虛擬空間相互參照，建構出認同的流動性。

三、族裔地景與城市再現

上一節所觸及的「雙鄉書寫」是移民文學中常見的題材，雙鄉的並置除了空間的對照之外，亦形成過去與現在時間的交錯，移民者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中，實質（親身移動）或抽象（以想像和文字）地移動。雙鄉並置亦指涉了移民者的懷舊之思，因為回憶，過去和故鄉得以存在，由上述幾篇小說的分析，得知李渝再現紐約的方式之一即是將紐約（新居地）與臺北（故鄉）並置，兩個空間的對照，寄情於兩地之情感與記憶，並且以小說作為主要的載體，使得「回到過去／故鄉」得以完成，這樣的策略呼應了移民文學中離散（diaspora）的特質，強調原鄉（homeland）的意義與連結，同時也反映李渝的移民身份，而跨界移動的經驗在書寫雙鄉的作品中得以凸顯。然而，在前言中曾提及，李渝和其他六〇年代由臺灣出發到美國的移民作家的不同之處有二：一是鮮少處理文化衝擊與失根流離之感，二是書寫新居地的作品數量不多，那麼要進一步探問的是，紐約之於李渝

³⁰ 李渝：〈叢林〉，《九重葛與美少年》，頁182。

存在著何種關係與情感呢？李渝又是以何種方式來觀看並直接地呈現她眼中的紐約呢？

紐約的城市空間，由摩天大樓交織而成的天際線，錯綜複雜的地鐵線，與文化多元的族裔街區（如韓國村三十四街，位於曼哈頓下城的中國城和小義大利，皇后區的法拉盛等）組成。觀看城市的方式，與人們日常生活與經驗息息相關，作家筆下的城市空間往往和其生命記憶緊密連結。在都市研究理論中，帕克（Simon Parker）認為「城市是『現代性之鏡』，讓我們得以同時身為個別主體和不同群體與部落的成員而自我反思。」³¹ 城市促使人與人的相遇進而產生關係，由一地移居到另一地生活的「外地人」與在地居民所觀看到的城市亦迥然不同。就紐約而言，觀光客眼中的紐約或許是時代廣場、百老匯或自由女神，道地的紐約客可能聚焦於生活或工作的地點，而來自臺灣的移民所熟悉的是原有「小臺北」之稱的法拉盛，廣東或香港來的中國移民時常到訪的是曼哈頓下城的中國城，由此可見，城市地景與觀看者的身份、族裔與經驗密不可分。城市作為「他者」，人移動到此，定居此方，因此透過城市的參照與意義的產生，重構了自我主體性，而書寫城市，亦是身份認同與地方協商的產物。

就族裔地景而言，各色人種確實是構成紐約城市空間的重要元素之一，而李渝的散文中亦不斷地描寫形形色色的紐約客，尤以不同族裔的人物為多，這一系列的作品多寫於 1983 年左右，並發表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保釣運動結束後，李渝的寫作一度中斷，直到 1980 年代再重拾紙筆創作，以短篇隨筆形式，紐約為背景的作品為重拾創作初期的風格之一。於此同時，亦以現代主義晦澀的筆法寫成小說作品〈煙花〉（1983），乃至於 1991 年集結成書的《溫州街的故事》都延續現代主義的筆法，可見在回歸文學創作的初期，李渝同時嘗試散文與小說兩種不同文類的書寫。³² 儘管經歷了保釣運動，對於歷史與政治的直接參與，但

³¹ Simon Parker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遇見都市：理論與經驗》（臺北：群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01。

³² 關於 1980 年代李渝重返創作初期的風格，不僅於體現散文的日常書寫，同時也以現代主義美學創作小說，此一觀點感謝論文審查者的提點。

這些大敘事的題材並沒有走入她的文字之中，反倒是由自身相關的生活環境取材。創作於 1983 年〈華盛頓廣場〉描寫一個在公園遇見且常在下午溜冰的黑人。不同族裔的人物時常出現在移民作家的作品中，透過人物形象的描繪與建構，體現出城市中的族裔關係。黃秀玲在〈黃與黑：美國華文作家筆下的華人與黑人〉指出華文作家的作品呈現「黃黑一家」與「黃黑殊途」兩個主要的基調，隱涉華人在美國社會中的邊緣位置與他者化。³³此外，黑人與華人，往往彼此拉扯衝突、歧視與刻板化，卻又在美國主流社會中遭遇相似的境遇。在旅美作家的筆下多為負面的黑人形象之外，李渝則開創了另一種「黃黑共榮」的可能性，她在〈華盛頓廣場〉寫道：

他愛穿緊身衣，顏色特別鮮豔。有時上身是玫瑰色，下身金黃；有時是夏格爾的畫裡的寶藍色；有時一身鬱黑，把臉和手腳的黑皮襯得郁亮，他那身肌肉以下，從後面看，特別漂亮；一塊一塊肉腱又挺又實，完美地排列著，有一股彈力要從底下像電光像熔岩一樣地爆發出來。³⁴

由上述的描述來看，李渝筆下的黑人形象，美好地像一幅畫，一座雕塑品，構成了華盛頓廣場美麗的一角，吸引人們駐足欣賞，存在城市空間中毫無違和感。李渝所代表的華人視角，描摹出黑人在廣場上溜冰的情景，藉由經常到訪華盛頓廣場觀看與欣賞，形成一種日常，並且與溜冰者同時共享這個空間，所謂的「黃黑共榮」即是在此廣場所展演和諧依存的关系與平和寧靜的跨族群交流。

同一時期書寫的另一篇作品〈五個東歐婦人〉以紐約的地鐵為背景，刻畫出車廂內的族裔群象，李渝提到伸長腿的黑人，穿著廉價夾克的南美洲男人，以及五個東歐婦人的出現：

³³ 黃秀玲：〈黃與黑：美國華文作家筆下的華人與黑人〉，《中外文學》第 34 卷第 4 期（2005 年 9 月），頁 16。

³⁴ 李渝：〈華盛頓廣場〉，梅家玲、鍾秩維、楊富閔編：《那朵迷路的雲：李渝文集》，頁 77。

車到下城某站，兩扇門左右滑開，突然捲進五個肥胖的中年婦人。她們前熙後攘（攘），嘩喇喇地又講又笑，一排坐開在我前面的位子上。她們說的話母音很重，像是東歐某種語言。雖已入冬，她們仍穿著單薄的夾外套，到膝頭的素花裙子，光著兩條粗壯的小腿。

一陣暖風自她們自來就開始在車廂裡吹起。我睜明了眼睛，從茫然中醒來，開始想，車外的天還亮著麼？雲還紅著麼？鴿子還在人行道上啄食麼？我深深吸進一口氣，嗅到草原的氣息。³⁵

與街道、公園一樣，地鐵車廂作為紐約重要的城市空間，亦是充滿了不同族裔的搭乘者，車廂和紐約具有相似的多元族裔與文化差異的包容性。李渝觀察到不同乘客的外表、打扮和狀態，或坐或站，或讀書或打盹，獨自一人，又或成群結隊，共同分享了乘坐地鐵的某一段魔幻時刻。值得注意的是，標示不同的族裔，如南美洲或者東歐，所強調的是紐約的城市特色與多元文化，亦呈現出作者透過欣賞的視角，透露出她與其他族裔移民的共融景象。

就城市空間的描寫而言，往往與作者自身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由於李渝任教於紐約大學東亞系，這個街區是李渝工作地點，是住家以外最熟悉的城區，紐約大學是沒有圍牆的開放校區，主要的建築物分佈在格林威治村、華盛頓廣場與聯合廣場附近。〈給紐約〉是寫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的散文作品，李渝描述她在上班途中所見所聞：

向下城財貿區駛去的六路地鐵，果然從十四街聯合廣場開始，今天便不能像往常一樣的順利。時走時停，時停時走，在隧道裡磨蹭著時間。到達艾斯特街紐約大學站時，我看了看腕錶，九點三十五分——得在五分鐘內趕到教室。³⁶

³⁵ 李渝：〈五個東歐婦人〉，梅家玲、鍾秩維、楊富閔編：《那朵迷路的雲：李渝文集》，頁82。

³⁶ 李渝：〈給紐約〉，張曉風編：《九十年散文選》，頁338-339。

透過交通方式描述城市空間，是許多作家擅長的寫作手法，同有旅美經驗的臺灣作家章緣在長篇小說《疫》中亦提及通往法拉盛的七號地鐵³⁷，地鐵是新居者認識城市的途徑之一，同時也將城市區分成不同的街區，李渝筆下的六號地鐵和艾斯特紐約大學站呈現了她平日上班的交通方式，也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元素。

在李渝的散文中，藉由日常生活行走路線與空間的觀看與凝視，再現她和紐約這座城市的關係，和其他在地居民相似地面對一如往常的早晨，搭乘地鐵通勤上班，正是她在紐約生活所建立起的日常秩序，藉由描寫地景與交通工具，指認她在城市之間的位置，視自己為一個在這座城市工作與生活的「紐約客」（New Yorker）。此外，地鐵是現代性的象徵，不僅僅劃分城市空間，建構都市的秩序，搭乘地鐵所帶來的生命經驗，亦與主體形成有關。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中指出自我認同是由生命經驗與特質組合而成的：

它是個人依據其個人經驗所形成的，作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認同在這裡仍設定了超越時空的連續性：自我認同就是這種作為行動者的反思解釋的連續性。……雖然存在這種觀念的一些因素對所有文化都是共同的，但對「人」的理解則肯定依文化的改變而改變。在轉換的場域中運用「主我」以及每個已知文化的特質的能力，是個人性的反思性概念的最基本特徵。³⁸

紀登斯所提出的概念可幫助思考「九一一事件」所引發的現代性想像與主體性的重構問題。〈給紐約〉的開頭敘述了因為「九一一事件」的發生，地鐵出現異常，延遲導致日常規律被破壞，同時也隱喻了災難的發生所帶來的影響，改變人類生活模式，透過這樣的書寫，李渝所傳遞的無疑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人」的本真性因外在環境更替所產生的質變。³⁹

³⁷ 參考謝欣芬：〈章緣《疫》的離散華人跨界移動與在地社群生成〉，陳萬益等編《臺灣文學論叢》（二）（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369-412。

³⁸ 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著，趙旭東、方文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臺北：左岸出版社，2005年），頁88-89。

³⁹ 此論點的延伸，特別感謝黃儀冠教授在研討會上的提點。

地鐵之外，建築物和商店是構成街景的主要元素，亦是日常生活的細節，侯如綺在討論李渝小說的意象敘事時，即指出「事件的展開都是在平常生活之中，也可說都以循日生活為場景底襯。日常生活意象的表現都是尋常而寧靜的，重視情境與氛圍的展現。」⁴⁰ 延續對於日常的細寫風格與對環境的高度敏感，李渝以寫實而細膩的手法紀錄「九一一事件」發生後，逐一記載走出地鐵站後沿途所見的建築和街景：

忙著出站，半走半跑。走完最後一階梯，就踏上街面時，一幅奇異的景觀卻使匆匆的腳步停下。

這樣美麗的雲，我跟自己說，紐約住了這麼多年都還沒見過呢。

艾斯特街地鐵站口，正面對了漂亮的拉菲葉街，右手有大書店，新穎的家具行，時髦的服裝鋪，左手「淘兒」唱片公司的桔紅色霓虹燈不關熄，「莎士比亞工作坊」和「公眾劇場」的棕紅色大樓掛著炫耀的招牌旗。今天，在這兩排聳立的樓房店面之間，寬敞的街道的底端，橫過街面，有一整段雲，厚厚的凝聚在那兒，上層是閃亮的白色，底層銀灰，濃密富麗，有點超現實，像亨利·盧梭的畫。⁴¹

在這段描述紐約大學附近地景的文字中，李渝寫出結合時尚與藝術的城市特質，每一個街道充滿細緻的藝術氛圍。然而，雲的意象描寫，卻隱微點出了「九一一事件」的發生，使用她擅長的繪畫語言形容雲的狀態，同時挪用盧梭的畫透露出街道底端的異常，有些詭譎，有些荒謬，卻如此寫實。如此細節的刻畫，一方面體現李渝對地景的熟悉度以及藝術的學養，將真實與虛擬的空間並置再現其視線所及的紐約；另一方面也承繼她一貫仔細而冷靜的語調，從她的文字中，我們得知「九一一事件」對紐約與紐約人的巨大影響，既寫實卻又超現實的難以接受，

⁴⁰ 侯如綺：〈歷史關懷與詩性特質的交鋒——李渝《溫州街的故事》與林耀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比較〉，《北市大語文學報》第13期（2015年6月），頁67。

⁴¹ 李渝：〈給紐約〉，張曉風編：《九十年散文選》，頁339。

在此並非強調族裔的差異，而是點出面對災難，人類所需共同面對的命運。

〈給紐約〉從李渝的親身體驗敘述「九一一事件」發生時，紐約城所經歷的巨變，她走過街道，抵達蘇活，卻見到了濃煙瀰漫中，傾塌的世貿雙塔，並回憶到雙塔完工後，人們漸漸習慣它的存在。世貿雙塔同樣是現代的產物，建築物的完成使之成為地標，散文中寫道：「時間過去了，與它朝夕相處的，四方來訪的人們，無論曾有怎樣的印象或成見，畢竟都要被感動，明白它為紐約帶來的視覺上的和城市生活上的重大意義。」⁴²可見這棟建築之於紐約的重要意義，人們無法忽視它的存在，且日漸成為生活的一部份。如同李渝所述：「在雙星誕生時，紐約使它榮耀；隕落時，紐約擁它入懷，用無比的悲哀和莊嚴，陪它進入歷史。」⁴³又一次點出了人、建築與城市之間的關係，共存於同一個空間裡缺一不可。對於居住在紐約多年的李渝而言，親身見證且經歷「九一一事件」，看似荒謬卻真實地在生命中，成為難以忘懷的一刻，紐約人的生活脈動隨著此事件的發生而改變。

「九一一事件」的發生，所造成的影響並不僅僅侷限於紐約的原居者，從世界各地移居至此的移民，又或從四面八方前來朝聖的觀光客，都受到災難的波及，造成身體或心靈的傷痛，此時卻更能看出紐約做為移民大熔爐，所展現出的氣度與包容，李渝如是描述：

給逝者尊嚴，給生者撫慰，又唯紐約能作得如此鎮靜，如此莊嚴。

受難者來自無數國籍和族裔；也唯紐約能容納異端，接受外來。

其實不只在世貿，就是在普通的任何角落，紐約都見各種膚色，各腔語言，令人隨時感到人種的多，族裔的不同。可是不管你從什麼地方來，一旦落腳紐約，便屬於紐約。只要你願意，就是紐約人，就是紐約的一份子，就能說「我愛紐約」。在這移民的國度，民族多到無法有「民族主義」，人人皆從外來，「本土」也無法成論，無法策動「本土」和「外來」的二分

⁴² 李渝：〈給紐約〉，張曉風編：《九十年散文選》，頁341。

⁴³ 同前註，頁342。

對立；沒人能聲稱土地的唯屬權，或認為只有哪種人才具有「本體性」，或者提倡宣告正統血脈。⁴⁴

許多作家筆下的紐約社會都是多元且開放的，李渝亦不例外。「九一一事件」後，不分族群，不分你我，一起療傷，一起面對失去這棟樓的痛，李渝的作品亦體現紐約對於移民的包容與接納，以及不同族裔人們所構成的特殊族裔地景。認同是移民國家所存在的複雜議題，紐約作為大熔爐，使得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生存的方式與位置，從這段文字中觸及對於主體性的思考，我們也可以看出李渝在思考本土與外來的議題之中，並非偏頗一方，視角由離散者（diaspora）轉移至世界公民（cosmopolitan），體現出悅納異己的胸懷，更強調人的本質具有多元包容性與普世關照。

關於族裔地景和都市空間的觀察與刻畫，多是以散文的形式出現，以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細節作為書寫主軸，並且以「人」的普世性為主題，一方面真實地呈現紐約的樣貌與城市特色，另一方面也點出李渝對此城市的熟悉與認同，因而得以從日常的細節出發去觀看這座城市，更重要的是有別於移民作家所關懷的文化差異與衝突，李渝在她的文字中所關懷的是人的包容性與災難後悲傷的超脫。

四、結語

李渝筆下的紐約，在小說和散文兩種不同的文類中，所呈現的面貌迥然相異。透過時空錯置的手法，小說往往將紐約與臺北，現在與過去並置，大量地挪用臺北的原鄉記憶在敘事之中，不論是臺北的街道，河流，或者食物，都在想像與回憶中，進入了紐約生活。然而，正因為兩條敘事軸的並用，讓真實與虛構，如同現實與夢境一般，模糊了臺北與紐約的界線，有些人物帶著回憶安然地在紐約生活，有些人卻像活在夢中而格格不入，有些試圖遺忘轉而面對當下，不管是哪種方式，皆呈現了移民與城市之間的關係，藉由具體與虛擬空間的建構，完成自我

⁴⁴ 李渝：〈給紐約〉，張曉風編：《九十年散文選》，頁343-344。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與他者的對話。

散文作品則在細節之中，真實地刻畫了紐約的城市地景，高樓大廈，地鐵，藝術氛圍和族裔地景，皆與李渝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關，透過她細膩的觀察與記錄，紐約真實地出現在讀者眼前，並且體現了現代性與主體形成的關係。記錄「九一一事件」，描繪族裔群象，書寫紐約大學附近的景致，一一點出李渝真誠地面對美國與在地生活，道出了紐約在她生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此外，藉由「九一一事件」的書寫，呈現了人類多元包容的本質，以及在災難之後的主體重建與傷痛超脫。

紐約之於李渝，又近又遠，鮮少書寫，卻悄悄地藏匿在許多篇章中，如同努力生活在異鄉的人們，不存在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在本土與外來的辯證中，在差異與衝突之外，李渝藉由書寫回歸人類本質性的思考，呈現其對身份認同的終極關懷。從李渝的文字之中，我們明白她的鄉園不僅僅是溫州街，也是紐約。

徵引書目

一、近人論著

(一) 專書

Simon Parker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遇見都市：理論與經驗》（臺北：群學出版社，2007年）。

白先勇：《第六隻手指》（臺北：爾雅出版社，1995年）。

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著，趙旭東、方文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臺北：左岸出版社，2005年）。

李渝：《溫州街的故事》（台北：洪範，1991年）。

李渝：《應答的鄉岸》（台北：洪範，1999年）。

李渝：《夏日踟躕》（台北：麥田，2002年）。

李渝：《九重葛與美少年》（台北：印刻，2013年）。

李渝著，梅家玲、鍾秩維、楊富閔編：《那朵迷路的雲：李渝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社，2016年）。

張曉風編：《九十年散文選》（台北：九歌，2002年），頁338-344。

黃啓峰：《河流裡的月印：郭松棻與李渝小說綜論》（臺北：秀威出版社，2008年）。

鄭穎：《鬱的容顏》（臺北：印刻出版社，2008年）。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Kevin Robins and Asu Aksoy, *Transnationalism, Migration and the Challenge to Europe: The Enlargement of Mean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二）論文

1. 期刊論文

宋雅姿：〈鄉在文字中〉，《文訊》第309期（2011年7月），頁30-42。

侯如綺：〈歷史關懷與詩性特質的交鋒——李渝《溫州街的故事》與林耀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比較〉，《北市大語文學報》第13期（2015年6月），頁51-80。

黃秀玲：〈黃與黑：美國華文作家筆下的華人與黑人〉，《中外文學》第34卷第4期（2005年9月），頁15-53。

楊佳嫻：〈記憶啓蒙溫州街——論李渝的「臺北人」書寫〉，《中國文學研究》第17期（2003年），頁199-224。

楊佳嫻：〈離／返鄉旅行：以李渝、朱天文、朱天心和駱以軍描寫的臺北小說為例〉，《中外文學》第34卷第2期（2005年7月），頁133-155。

叢甦：〈沙灘的腳印：「留學生文學」與流放意識〉，《文訊》第172期（2000年），頁49-51。

蘇偉貞、黃資婷：〈立望關河到鶴群歸來：李渝小說跨藝術互文的懷舊現象——以〈關河蕭索〉、〈江行初雪〉、〈無岸之河〉、〈待鶴〉一組小說為主〉，《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24期（2017年4月），頁169-198。

Sara Ahmed, "Home and Away: Narratives of Migration and Estran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3 (1999): 329-347.

2. 論文集論文

謝欣苓：〈章緣《疫》的離散華人跨界移動與在地社群生成〉（二），陳萬益等編《臺灣文學論叢》（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369-412。

3. 學位論文

謝欣芩：《異鄉人的紐約：華文小說的離散華人書寫與地方再現》（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New York as One of Homelands

— Ethnic Landscape, Temporal and Spatial Juxtaposition in Li Yu's Work

Hsieh, Hsin-Chi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Cul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ethnic landscape, temporal and spatial juxtaposition in Li Yu's work. Li Yu is a writer who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60s and lived in New York until her death in 2014. She is famous for her Wenzhou Street series, and her work addresses Taiwa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pei by adopting the strategies of juxtaposition of fictionality and reality, dream and spatial writing to represent nostalgia, migration experience and identity. However, in comparison to other immigrant writers, she rarely touches upon cultural shock, ethnic issue or rootlessness in the host state. In terms of geographic locale, New York has the second large population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and has been a major location represented in literature. Living in the city for more than forty years, New York must be meaningful for Li Yu in life.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analyzes Li Yu's writing on New York to tease out the rel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immigrant and the host state. It argues that through the immigrant's perspective, Li Yu's representation of New York is twofold: juxtaposition of homeland and host state, and cosmopolitan outlook on humanity. It aims at offering an alternative angle of studying Li Yu's work by pointing out the significance

of her writing on New York as another homeland.

Keywords: New York, Immigrant, Ethnicity, Subjectivity, Temporal and Spatial Juxtaposition